

方国瑜 主编

雲南史料叢刊

第一卷

徐文德 木芹 纂录校订

云南大学出版社

方国瑜 主编

雲南史料丛刊

第一卷

徐文德 木 芹 纂录校订

云南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林超民 郑志惠

封面题签:楚图南

篆刻:段雪峰

云南史料丛刊

(全 10 卷)

第一卷

方国瑜 主编

徐文德 木 芹 纂录校订

*

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翠湖北路 52 号)

昆明新星印刷厂印装

*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44.75 字数:912 千字

1998 年 2 月第一版 1998 年 2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00(精装)

ISBN 7—81025—828—1/K·127 定价:168.00 元(精装)

新
平
和
婦
學
PDG

方國瑜主編

雲南史料叢刊

楚圖南題





方国瑜教授



云南大学历史系地方史研究室在集体研究《云南史料丛刊》的修订

从左至右为：郑志惠、徐文德、林超民、方国瑜、木芹

前 言

马克思说：“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也指出：“要像马克思所说的详细地占有材料，加以科学的分析和综合的研究”，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进行研究的第一步，是详细地占有材料，研究一切问题必须如此，研究云南历史也不例外。

为了占有材料，必先搜集整理材料。这是比较繁重的工作。但是，不能指望所有研究者都致力于此，需要有人肯出气力，把详细的材料提供出来，给研究者得到方便。前人已意识到这一点，在整理云南历史资料方面，已经作出过一些成绩。如师范（荔扉）作《滇系》凡四十册，其中《典故系》八册，《艺文系》十八册，占全书过半。又王崧（乐山）作《云南备征志》，收集前人纪载滇事之书，汇编成二十一册。陈荣昌（小圃）重刻《备征志序》称此二书为滇中掌故之尤著者。师、王之书一刻再刻，历年印刷，流传甚广。研究者“得此一编，众本咸在”，有很大方便。近世秦光玉（朴安）作《续云南备征志》三十卷，仅排印过二册，惜未完工。像这样网罗史料，汇编成书，少数人出力，多数人应用，对于研究云南历史是有益的，也是必要的。

编纂史料成书，供研究者应用，首先要求完备而且确实，使研究者信得过，用得上。但前人所作，由于时代局限，所见不周，不免粗疏；又作者大都为封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其编书的立场、观点是很成问题的。如《滇系》取材，多不注出处，令人难索解；注出处者，文句又多更易，而于书中删润原文，往往有之，其附论亦多空乏。《备征志》搜录虽勤，犹多未尽，全书仅六十余万字。秦光玉《续备征志》亦非完备之作。又师、王二书，今之通行排印本及刻本，因辗转传抄翻刻，未作精校，字多讹夺，且有错简。在前人基础上有所提高，把云南地方史的研究再向前推进一步，是新时代提出的要求，也是今天史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这部《云南史料丛刊》的编纂，始于一九六五年，当时被列为重要的教学与科研项目之一，既为教学参考之用，也提供给留心这门学科的研究者。才刻印第一集，不久，“文化大革命”起，原订计划被迫搁置。粉碎“四人帮”以后，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万象更新，这项工作又于一九七八年六月重新提上议事日程。经过五年的努力，已刻印五十六辑，约六百余万字，分送有关单位和个人征求意见。我们编辑《丛刊》，始终把握两条：一为提供资料，二为提供意见。为贯彻这一精神，分为“概说”、“正文”、“后记”三个部分。提供资料，则求其完备而且确实，凡涉及云南历史之专书、专卷、专篇、专条，靡不收

录。此外尚有专条的辑佚、摘录。但对于文物资料的收录，只限于有文字记载者。为求史料之确实，凡收入本丛刊的史料，均据原书善本作校刊、考辨，注明出处；或作附录，供读者参证。

向研究者提供意见，主要是方国瑜先生所撰之“概说”（多录自中华书局出版之《云南史料目录概说》，略作修改）。在每篇史料之前，著录文献、文物名目，略作说明。前人之作，有称叙录、解题、提要、题记、题跋、概论等，今称“概说”，意为大概说说，不计详略，不拘一格，结合史事抒发意见。其主要则有二事：一为史料之来源，一为史料之阶级性。

云南地方的历史资料（撰述与文物），保存至今者甚少，而这为数不多的史料，或因出于统治阶级之手，歪曲、诬蔑、捏造者逐处有之；或在其流传过程中，人们辗转传抄、翻刻，以及注解、评论，各本文字有讹夺、点窜，解说有曲直、异同。所以，阐明史料之来源、版本流传，结合史事之时间、空间与撰人之活动，进行考究和批判，恢复其初文、初意，辨别其曲直、异同，才能确定史料的价值所在。其来源过程，有在史料本身已说明，亦有未具，当进行考察，兹举重要者，如：司马迁作《史记·西南夷列传》，所载事迹，取自档册以外，因曾从军亲至西南，任中郎将，为经略此地区进行调查研究，故所作记录多有依据。又《汉书·地理志》记西南诸郡之水道、矿产，则据郡县所报而编纂之地理图志，为经过调查之记录。又《后汉书·西南夷列传》载哀牢夷事，出自杨终《哀牢传》，为哀牢使者所述。应劭得杨终之书录在《风俗通义》，范曄又得应劭之书转录于《西南夷列传》。又《通典·边防典》“松外蛮”条，记西洱河风土，为杜佑得梁建方出兵至西洱河时之记录。又樊绰《云南志》，其卷二至卷十，录自袁滋《云南记》，而袁滋书录自出使南诏时所得地方图志之书。又《新唐书·南诏传》载风土二千余言，部分出自樊绰书，其余出自徐云虔使南诏时所作《南诏录》。凡此，史料本身并未言之，经过考究，大略可知。

亲身经历之作，也未必尽符事实，当辨明其事。如魏晋间亲至西南者作《永昌郡传》，所记之“尾濮”；元李京亲至云南各地，作《云南志略》，所记之“越嵩罗罗”；明万历间随军亲至云南者作《西南夷风土记》，所记之“地羊鬼”；说有其事，实则无稽之谈，蓄意诬蔑，如此者甚多。

至于纂录之书，虽依据记录而有未经审核者。如：郦道元《水经注》，征引有据，而以意贯穿水道，有错杂难明或无其水者。又常璩《华阳国志·南中志》，稽诸旧纪，纂录成书，因取诸家之说，有先后不一致者。若此之类，后人编书多不免有。

又有依据记载而窜改文字者，如《元史·地理志》州县沿革之大理时事，据《云南图志》，《图志》有所本，而窜改称号，以致年代不清。万历《云南通志》记民族，改易前志“白”、“僂”用字，后来有从前志，有从万历《志》，以致错乱不堪。乾隆年间聚珍版丛书从《永乐大典》辑出《云南史记》之文，而改易书名为

《蛮书》，意在诬蔑，不知者盲从之。故所录资料有依据，而因无知或蓄意篡改原文，以致令人迷惑者，往往有之。

又纂史之书，编者自述史料来源及其所作伪说以欺世人。如：《滇载记》出自《白古通·绎年运志》，早已有汉文传本。明嘉靖初，姜龙得张云汉抄本，付杨慎稍为删正，而杨慎冒名为己作，自言译白文《玄峰年运志》为书，李元阳亦称道之，实一骗局。《云龙记往》为董明善作，王文凤得之改署己名，章学诚又得之收入《实斋文集》，并自言删正。实则三本几全同，王、章抄袭而冒名己作，其行可鄙。至于《南诏野史》，伪托杨慎撰；《白古通浅述》伪托赵顺撰，乃后人比附，并非有据。

尚有虚构史事者。如《隋书·史万岁传》之“西洱河诸葛亮碑”，樊绰《云南志》之“石城诸葛碑”，其事离奇不可究诘。更有甚者，宗教迷信之神话传说，娓娓动听，实则无根之谈，莫究其始。

更重要者，则为洞察史料之社会性，即阶级性。所有历史资料，都有其意图，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须结合历史实际进行综合研究，揭露撰人之政治倾向与实际目的，才能正确总结历史经验，探寻历史发展的规律。云南地处边陲，少数民族错杂而居，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比内地落后，历代王朝设置政区，适应社会基础，秦汉以来有内郡、边郡之分，隋唐以来有内州、边州之别；政权形式虽有不同，国家主权则无二致。但是，由于统治者之偏见，歧视边地，认为“化外”羁縻，实行大民族主义压迫，更使其发展延缓。史家倡“异内外”之说，发挥“尊王攘夷”、“夷夏大防”等反动观点，为统治者作伥，史籍记录缺略不实，且多诬蔑之辞。如班固《汉书·序传》说：“西南外夷，别种殊域”。用“外”、“别”、“殊”之贬词，历来史籍多如此，故长期以来，云南地方历史遭到歪曲，真相被隐晦。更有甚者，中国封建史学家的谬见，在近代被外国野心家利用来为其侵略、分裂中国服务，他们胡说：中国不是各民族共同缔造的统一的民族国家，而是帝王征服为动力，在历史上无稳固的疆界；中国历史上的边界，西部不超过甘肃、四川；云南是印度支那半岛诸国之一；等等。这无疑是必须严加驳斥的，但也要看到，其立论的主要依据，乃是中国封建史学家的某些错误记载。所以，对典籍作一番批判性清理，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让外国野心家无空子可钻，乃批驳其谬论之上策也。

云南自古以来就是中国整体的一个部分，云南历史的发展过程与全国形势息息相关，在各时期情况虽有不同，其本质则毫无差别，因云南地方曾是少数民族聚居的边郡、边州，就把它视为“别种”、“殊域”、“化外”，是十分错误的。又；忽视边地各族人民与中原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看不到各族劳动人民共同创造中国的历史，而把统治者当作历史的主宰，乃是唯心史观。

凡此种种，我们都试图在“概说”中加以讨论，惟限于理论水平低，知识亦疏陋，所提意见未必确当，错误在所难免。望读者匡之正之。

本《丛刊》在概说、正文之后，还有后记。后记出自诸编辑人员之手，其内容主要是对正文校勘所据版本加以必要的说明和解释，也补充一些概说中未提到的意见。

收入《云南史料丛刊》的史料，以校点的方式进行整理。所选用的底本均由方国瑜先生把关选用较好的版本作底本，对有价值的前人所作的注、笺、疏、证、解、索引等均保留所选底本段或篇（卷）末注和夹注的形式。今纂录者对史料的校勘，一般以校勘记的形式附于段或篇（卷）末，个别的校语是校前人注释中的字句，就以纂录者按语的形式出现在前人注释中。纂录校订者的按语采用省称，如“徐文德按”称“德按”；“木芹按”称“芹按”。

《云南史料丛刊》最初规划于1965年，第一辑油印刊行不久，因“文化大革命”开始而中断。1978年6月，在方国瑜教授主持下，将《丛刊》列为云南省古籍整理重点项目，重新开始编纂，至1983年，共油印57辑，行世以来，深受各界人士的好评。然油印本仍随作随编成集，陆续交坊刻印，其时序，内容未遑顾及，查阅起来很不方便。1983年计划依时序、按内容及数量分二十卷（32开本，每卷30万字左右）分期交云南人民出版社排印出版，因故至1990年仅出第1卷。今改由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仍按时序、内容及数量编排为16开10卷本，将为研究者查阅、使用提供方便。

《云南史料丛刊》本着方国瑜教授制订的“搜集资料，求其完备；校录原文，求其确实”，“得此一部，众本咸在”，“使研究者信得过，用得上”的编纂原则，收录了散见于浩如烟海的先秦至清末中国古籍中有关云南地方历史的文献资料和文物资料近400种（部或篇），成为云南文化史上收书最多、最系统、最可信的一部大型史料丛书，是研究云南古代社会、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诸方面必不可少的参考文献。

方国瑜先生在编辑此套丛刊时曾说：历史资料的收集整理是一项极为艰苦细微的工作，也是一项吃力不讨好的工作，所以“智者不为”。但史料是研究的前提。我们下功夫做好这项工作，“少数人出力，多数人使用”。

如果《云南史料丛刊》的出版能实现方国瑜教授生前的愿望，能为云南历史文化、社会经济诸方面的研究尽一点力，我们就因没有辜负方先生的教诲，没有辜负时代与人民的期望而感到极大的幸福与快乐，也可以此告慰方先生的在天之灵。

云南大学历史系地方史研究室

一九九七年七月

方国瑜传略

林超民

先生姓方，名国瑜，字瑞臣，云南省丽江县人，纳西族，清光绪二十九（1903年）正月十八日诞生。因不通汉语，九岁始发蒙读书。自谓“资质粗笨”，故勤奋补拙。读《论语》“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之句，不甘居下，自署书屋为“困而好学斋”以自勉，促居书屋，终日伏案，所读四书五经诸子之文，至老犹能背诵如流。

1922年夏，先生毕业于旧制中学，乃离乡远游，1923年4月到达北京。1924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预科，以学习勤奋、品学优良见重于师友。先生从中国共产党主办的《向导》周刊接受民主革命思想，以“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相号召，积极投入反帝爱国的学生运动，与同班好友湖南谢伯屿（中共北京市委委员）被推举为校学生会干事，后被选为北京市学生联合会干事和全国学生总会干事，参加了纪念“五四”运动五周年在天安门示威游行的组织工作。北京市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政治生活》就在这一天发行创刊号，这个刊物的主办人是云南剑川人张伯简。早在丽江念中学时，先生就读过张伯简从法国寄来的共产主义宣传品，对张十分仰慕，得知张伯简在京主办革命刊物，便主动与他取得联系；又通过张伯简认识了《向导》周刊的发行人李树青。在担任全国学生总会干事期间，先生与谢伯屿、吴平地（中共党员）等共同组织北京师范大学预科学生去天安门参加示威游行，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等口号，要求赶走黎元洪、曹锟，迎接孙中山先生来京组建“临时政府”。当孙中山先生到达北京时，先生被举为学生代表，进入火车站月台迎接孙中山先生入京。

1925年，先生参加天安门广场举行的“五四”运动纪念大会。游行示威时，先生奋勇当先，与警察英勇搏斗，右臂被打伤。先生不因此畏惧退缩，斗志愈高，为揭露上海“五四”惨案的暴行，在伤体尚未恢复的情况下，毅然率领一个学生小分队到天津、济南、南京、扬州等地宣传。返京后，先生即加入云南左派学生组织“新滇社”，并主办《云南》周刊，积极鼓动革命。

1926年夏，先生患大病住院，不久休学回家。1927年龙云等四镇守使发动云南“二·六”政变，战乱峰起，土匪横行，先生困在丽江，埋头读书。1929年秋，北上复学。因挚友谢伯屿、吴平地于1927年4月与李大钊先生同时被捕，又同时慷慨就义，先生无法与党取得联系。因大革命失败，学生组织涣散，学生运动沉

寂。而“整理国故”之风方兴未艾，先生乃立志于国学研究，为中华民族争光。复学时便要求入北师大国文系本科，系主任钱玄同，以先生在预科读书时已有几种著述，准许跳级，直接在本科二年级注册。

1930年春，在钱玄同的鼓励下，先生考取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研究生，同时在两个学校研读，先后从钱玄同、余嘉锡、马衡、刘复诸先生，攻读音韵、训诂、目录、校勘、金石、名物之学，又得高步瀛、吴承仕、黎锦熙诸先生的指导。与此同时，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陈垣（援庵）见先生所写《中国道教史》颇有见地，知先生是边疆少数民族学生，殊为器重，指导他选修大量史学课程，并从杨树达、梁启超诸学者治史地之学。先生回忆说：“我在北京求学期间，多闻议论，开阔眼界，稍知读书门径，想以学术上成就最高的几位先生为榜样来深造，曾刻意读《章氏丛书》，觉文笔深奥，论说抽象；又读《饮冰室集》，觉感情奔放，议论酣畅；读王国维、陈援庵先生的论著，感到朴质存实，方法严谨。读王先生书，将创新意，作文议论；读陈先生书，有所补苴，多作札记。因此王、陈两先生对我影响较大。还有冯承钧翻译法国汉学家的著作数十种，也有人翻译日本学者所作西域南海论著，我都细读，增益新知。”这段时期，先生纵观四库典籍，广及海外译著，钩稽故实，发微阐幽，多有论著发表于报刊，为学术界重视。先生生前清理30岁以前存稿，认为可取而亲自编定者，有《广韵声汇》一书（共三十八卷，分装两函十二册）；《困学斋杂著五种》，包括《广韵声读表》、《隋唐声韵考》、《慎子考》、《慎子疏证》、《论学存稿》。尚有《说文声汇》、《释名声汇》、《石鼓文研究》、《论语朱注匡谬》等底稿若干册。

1932年，先生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本科，第二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先后任北京师范大学研究院编辑员、洛阳师范学校教师、北平私立民国大学国文系教授。当时，刘半农任北京大学研究所所长，建议先生回乡整理研究纳西象形文字。1933年秋，先生回到故乡，深入到金沙江边的石鼓、巨甸等地考察，首次发现纳西标音东巴文摩岩，向东巴经师学习，调查记录了大量东巴文资料。1934年6月满载纳西象形文字资料回到北京。不久，刘半农先生病歿，经董作宾介绍，到南京向赵元任、李方桂两先生学习语言学，用国际音标给纳西语标音，编成我国也是世界上第一部科学的《纳西象形文字谱》。

先生回乡搞纳西象形文字时，在昆明与袁嘉谷先生会晤，纵谈滇人旧学，深得袁的赞许。当时周钟岳、由云龙、赵式铭、方树梅等正筹办纂修《云南通志》，希望先生能参与其事，先生遂有心于云南史地之学。回北京时，携带《云南备征志》、《滇系》诸书，潜心研读。1934年秋，先生在南京寄住历史语言研究所，所内藏书十分丰富，南京图书馆又多有善本，得尽情纵览，约一年时间，辑录云南地方史料盈篋。先生后来成为云南史学界巨擘，其根基于此奠定。

时值中英会勘滇缅边界，英、法帝国主义觊觎我云南边疆，蚕食鲸吞，凶相毕露。先生痛感清季外交丧权辱国，满怀爱国义愤，撰写文章，考证中国西南边

疆沿革，以历史事实痛斥英、法侵略者无耻谰言。由此，倍感史地之学在维护祖国统一、反击侵略中的重大作用，立定志向，专攻西南史地之学。先生所撰《纳西象形文字谱》成初稿后，携往苏州拜谒章太炎先生求教。同时拜谒李根源先生，以云南史地请业，李根源先生肯定其成绩，并指出所论史务多空洞，建议深入边界，实地考察。经李根源推荐，先生回云南参加界务交涉。1937年9月到滇西边地考察，亲履傣族、拉祜族、佤族地区，写成《滇西边区考察记》等专著。此书迄今乃为学术界推崇，为民族学、边疆史地之学的重要参考文献。

1936年夏，经袁嘉谷先生一再邀约挽留，先生在云南大学执教，先后任文史系教授、文史系主任、文法学院院长。1938年后，又连年兼任云南通志馆编审、审定、续修之职，撰写了《建置沿革》、《疆域考》、《金石考》、《宗教考》、《族姓考》诸目；并参加了全书的编纂和审定工作，为《新纂云南通志》的编纂工作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编《新纂云南通志》时，曾拟议由先生任总纂，并到重庆审定全书；为此，当局举先生为伪立法委员，既有名望又有高薪。当时通货膨胀，文人收入低薄，先生家计殊为困难。但是，目睹反动政府贪污腐败、营私舞弊，先生以要做清白正直的学人，不为肮脏奸滑的政客为宗旨，严辞拒绝。不久，当局又以“社会贤达”名义推先生为国大代表，以高官相邀，以重利引诱，尽管先生生活拮据非常，仍不改初衷，多次通电省选举委员会和丽江选区，坚决推辞，而专心于教学和著述。

抗日战争期间，先生邀约凌纯声、向达、楚图南、闻宥等学者编辑出版《西南边疆》杂志，指点江山，纵论边政，研究边疆史地，探讨民族风俗。云南大学创建西南文化研究室，先生任主任，克服资金不足、纸张缺乏、印刷不便等困难，先后出版丛书十一种，为活跃后方学术空气，提高边疆学术水平，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1946年，保山旅省同乡会聘约几位学人纂修县志，推先生任总纂。在此之先，先生曾协助李根源先生编纂《永昌府文征》，多作题跋。先生到保山乘便收集滇西抗日战争资料，周历惠通桥、松山、龙陵、芒市、遮放、黑山门、畹町、腾冲诸战场，广收战报文书，走访亲历其事者，写成《抗日战争滇西战事篇》六卷，为国内关于滇西抗日战争最翔实最珍贵的资料之一。其中一部分收入《保山县志》。先生主持的《保山县志》编成三十余册，已誊写清本交县志馆，今存保山市文化馆。

新中国成立后，先生在政治和学术上都获新生，从潜心考据的学术生活中解脱出来，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以高昂饱满的政治热情，勤恳踏实的学术态度，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献身于党的教育事业和云南地方史、民族史的研究。在繁忙的教学、科研之余，先生还积极参加社会活动，1954年参加云南民族识别的领导工作，1956年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事务委员会组织的

全国性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担任云南省民族调查组副组长；参加创办云南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研究所，并任副所长。先生夜以继日，查阅大量文献，编写了《云南民族纪录》等重要参考资料，并亲自在楚雄、大理、西双版纳、德宏、凉山等少数民族地区考察、指导工作，为云南省的民族调查与民族识别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4年，周恩来总理来昆明，视察云南大学时指示：历史系应结合地方特点，加强民族史的教学与研究。先生立即响应，同年秋季就在历史系开设了云南民族史课程，在短短的半年时间里编写了六十余万字的《云南民族史讲义》。第二年又开设云南史籍评论课程，写成《云南史料目录解题》一书作为教材，接着又开设彝族史、白族史等课程。这些都是从无到有的创举，为云南民族史的教学与研究开拓了道路、奠定了基础。在先生的努力下，1959年秋，历史系创办中国少数民族史专业，并与其他教师合作编写《中国少数民族史讲义》上中下三册约80万字。1963年又创办云南民族史研究室，1979年发展为西南边疆民族历史研究所。从50年代起，先生先后招收三届中国民族史研究生，从1978年起，又先后培养三届硕士研究生、一名博士研究生，并接受一名外国留学生、一名外国进修学者。昔日冷门寂寥的学科，已渐呈繁荣景象。云南大学历史系以民族史的教学和科研显出特色，受到国内外的重视，今天国内不少有成就的西南民族史、民族学的中青年专家，就是先生亲自培养的学生。

“文化大革命”的狂飙席卷中国大地，锋芒所向，直指学有成就的专家教授，先生亦不能幸免，被扣上各种莫须有的罪名，遭受非人的侮辱、折磨和迫害，住房被强占，书柜被查封，不少书籍文稿被掠劫而去。先生坚信，这决不是共产党的政策，抱定“别人想怎么说由他，自己应如何做在我”的宗旨，白天挨批斗，晚上局促于狭窄拥挤的房间里俯首案头，奋笔疾书，改造旧作，撰写新篇。1969年10月，先生被赶到弥勒县农村“改造”。第二年春，周恩来总理指示要编好《中国历史地图集》，先生是该“图集”西南组的负责人，被召回去参与工作。尽管当时仍是“控制使用”、“监督改造”，但先生置之不顾，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克服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于1972年底与尤中、朱惠荣等同志一起完成了《中国历史地图集》西南部分的编绘工作。1973年初，又着手整理《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到次年8月完稿，全书80余万字。因过度劳累，9月初，胃溃疡病大发作，吐血过多，一时不省人事，经医生抢救，切除胃脏五分之三，疗养调理四个月后方康复。还躺在病床上，先生便考虑《云南史料目录概说》的整理和撰写。出院后，立即动手工作，多年眼疾，因工作而日趋严重，视力减退，有加无已，到1975年，看书除戴深度“盲人眼镜”外，还须加一高倍放大镜。写字因数十年锻炼，“指头有眼”，虽写时已看不清，仍勉强成字。先生就这样坚持俯案著述，无日或已，经两年努力，终于完成百万余字的《云南史料目录概说》。

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先生心情振奋，精神焕发，他写道：“举国欢腾，欣

欣向荣,鼓舞着我不能丝毫松懈,要克服一切困难,加倍努力。”^①“瑜虽目力困难,丧失独立工作能力,但意志不能稍衰。”^②1980年先生向党提出了入党申请,他在自传中说:“今年我已是七十七岁,但在大好形势下,并无迟暮之感。在党的领导下,前途无限光明,矢志为社会主义事业,为建设现代化强国,竭尽绵薄之力。”先生想到来日无多,更加珍惜时间,忘我地抓紧工作,自1978年起,克服双目失明,年高体弱的困难,主编了800余万字的《云南史料丛刊》。同时为国家培养了一批硕士、博士研究生。

1983年12月23日上午,先生和往常一样,听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与报摘”节目后,便开始紧张工作,先与一位助手审订即将交出版社的书稿《云南史料丛刊》第二辑。接着与江应樑教授商谈《中国少数民族史》的编写工作。送别江先生后,又与另一位助手研究《清代云南文物考说》一稿的修订工作。近十二时,先生突觉头痛,歪倒在沙发上,当助手前去扶时,先生说了一句:“快整理稿子!”便昏迷过去。

在昆明医学院,经医生多方抢救,终因病情急剧恶化,医治无效,于24日清晨八时心脏停止了跳动。先生在繁忙的工作中,遽然离开了他一生为之献身的事,他以顽强的意志、勤勤恳恳、不知疲倦地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实现了为党的事业奋斗到最后一口气的誓言。

先生的一生,是追求光明、追求进步、追求真理的一生。先生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先生一再向党表示:“要求入党是我二十多年的愿望,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是我的人生目标。”根据先生生前的申请,经云南大学党组织讨论通过,报请中共云南省委批准,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先生在云南大学执教47年,建国后,历任云南大学文史系主任、文法学院院长、九三学社云南省工委副主委、云南省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全国史志编纂委员会顾问、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顾问、亚非学会理事、中国教育学会理事、云南省民族研究所副所长、云南省民族调查组副组长、云南省文联副主席、云南省历史学会会长、中国史学会理事、云南民族学院顾问等职。1950年后,曾当选为昆明市各族各界人民代表,第一、二、三届云南省人民代表,第五、六届云南省人大常委,第三、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

先生是云南地方史和西南民族史研究不知疲倦、勇往直前的拓荒者和勤恳踏实的奠基人。著名史学家徐中舒教授称先生是“南中泰斗”、“滇史巨擘”。

先生在云南史学研究中最重要贡献是对云南地方文献的收集和整理,其代表著作是《云南史料目录概说》。有关云南史料目录的著作,较早见于万历《云南

^① 《云南史料目录概说·后记》

^② 《滇史论丛》第一辑。

通志》，其书《艺文志》著录云南史事之书，自汉迄明仅只二十一种，所录甚少，且有讹误。其后，谢肇淛《滇略》卷八《文略》、刘文征《滇志》卷十八《艺文志》、康熙、雍正两部《云南通志·艺文志》等书都有专目著录，但大都简略疏陋。道光年间编纂《云南通志·艺文志》，乃仿《汉书·艺文志》之例，编录书目，凡记载滇事之书二卷，滇人著述之书二卷，金石文字二卷，至是，专题编撰云南史料目录，粗具规模。其后，光绪两本《云南通志·艺文志》稍有增补。近人方耀仙致力於云南文献，经历20余年搜访，编撰《云南艺文考》著录滇人著述1460余种，已称详备，但记载滇事之书，出道光、光绪《云南通志·艺文志》之外者甚少，而且解题亦不过录旧文而加删削，可取无多。近人李小缘撰《云南书目》，惟取《通志》所载及近人撰述，兼取外文篇目，稍加分类而已。先生的《云南史料目录概说》著录自汉至清记载云南史事之书，搜访殆尽。重要材料，或一书中仅有只言片语也详加考核；而无关史实的记载，如明清时滇人诗文集近千种，书中仅只著录数种，以概其余。此书对于云南史料（包括文物资料）的搜集、整理，是一部集大成的著作；本书对于云南史料的著录、评说，是迄今最为完备的一部，是超迈前人的力作。

先生强调，“史料目录是史学研究的基础”。史料目录的任务，是动用目录、版本、校讎、文字、器物、年代、文献诸学科，考究史料的来源、流传，辨别抄袭、窜改、真伪、分析史料的社会性，以及史事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做好这一基础工作，可以使历史研究收事半功倍之效。但是，基础工作要投付大量劳动，成果供别人研究所用，被认为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旧社会，研究者都为个人名利，各人都做资料收集工作，待问题研究好，拿出论著，却把资料毁掉，“绣罢鸳鸯从君看，不把金针度与人”成了风气。这是中国学术所以进步延缓的一大原因。先生对此种风气深恶痛绝，常说：“所有知识都是属于社会的，来自社会，归于社会，非个人所得而私有，乃通过个人劳动，在已有基础上增益新知。”^①先生从1934年秋开始，近五十年孜孜不倦地致力于基础工作，编成《云南史料目录概说》100余万字，著录云南史料800余目，既为研究者提供资料，又为初学者指引门径。先生不惮劳烦，呕心沥血为我们做了这项艰巨的奠基工作，方便了后学，帮助了读者。今天，每当我们便利地使用他的研究成果时，总是满怀感激之情对他为史学界和我们后辈付出的辛勤劳动表示由衷的崇敬。

自来著作目录之书，有历史家书目，有收藏家书目，有鉴赏家书目，有读书家书目，各有要求。《云南史料目录概说》以读书要求为主，结合各家，求其完备，也就是为研究云南历史“提出资料、提出问题、提出意见”。作为此书的一大特色，即不仅说“书”，而且论“史”；不仅注意对史料的来源、流传认真考核，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而且确定史料的历史价值，结合历史事实进行评述，以求阐明历史真象及其发展规律。先生十分推崇乾嘉学派，潜心史料的考据。解放后，先后

^① 《云南史料目录概说·弁言》。

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自觉改造世界观，紧跟时代的步伐不断前进。先生自述说：“瑜留心云南地方史，先后异趣而实相承，其初治文献之学，纂录故实，比勘考辨，囿于地方志书体例者十余年。后乃解脱，稍习科学，略知奥秘：盖从累积现象探寻实质。”^①此为先生认真学习历史唯物主义的心得之言。因学习马克思主义，使先生不仅在书目著录上比前人丰富完备，而且在史料的分析评论方面远远超越前人；不仅在史料的搜集整理诸方面为后人开拓了道路，而且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史料方面给后人树立了榜样。正如评论家所说，《云南史料目录概说》“为云南历史的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是近年来我国史学著作中难得的硕果”^②。

完成《云南史料目录概说》后，先生双目几近失明，但意志不曾因此稍衰，1978年春，即与云南地方史研究室的同志着手编纂《云南史料丛刊》。先生说：研究历史，要尽可能地占有资料；而资料的搜集整理犹如农田基本建设，既必要，又繁重，需要有专人来进行；少数人出力，多数人使用。只有从浩如烟海的古籍文献中，把有用的资料汇集整理出来，才能使科研工作搞得又快又好。先生亲自为《云南史料丛刊》制定了编纂原则：“搜集资料，求其完备；校录原文，求其确实。”使研究者信得过，用得上，“得此一部，众本咸在”。在先生主持下，《云南史料丛刊》编辑油印五十七辑，约800余万字。选编史料，不论专书、专篇或专条，均据原书善本作校勘，或辨伪、或辑佚、或考订，务求精确细致，每篇史料前有概说，后有校记，辨章学术、考究源流，介绍著述经过，评论长短得失。概说与校记，实事求是，常见新意，“不淹没前人，要胜过前人”。《云南史料丛刊》刚一编出，立刻得到史学界的欢迎，认为是云南文化史上的重点工程，将对云南社会科学的研究产生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

先生另一独特的贡献是开拓了对中国西南历史地理的研究。当英帝国主义自印度侵占缅甸、法帝国主义囊括印支三国，觊觎云南、侵入边境之时，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关头，先生毅然改变原来的研究方向，转而考究云南史地。1935年，参与云南界务交涉；1938年参加《云南通志》的编纂工作，撰写《疆域沿革》、《历代建置》等十卷，填补了云南历史地理研究的空白。1961年秋，参加改绘杨守敬《历代疆域图》工作，结合绘图，改写旧作，至1956年春，编成《中国历史地图集·西南历史地理考释》，分三册油印。但先生仍觉不满，又查阅已读未读之书，作了许多修改，有的在印本批记贴签，有的则改补写稿，到1968年春，改订为八篇，但先生仍不惬意。1970年，重新参加《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绘工作。1973年顺利完成该图集西南部分的编绘。接着将文字稿反复考究，删补修改，重作新写，于1974年编定《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六篇百余万言。先生在书中强调，中国是以汉族为主干的多民族国家，历史上的中国不仅包括汉族和中原王朝，也包括各少数民族及其建立的地方政权。中国的历史疆域不仅包括中原王朝的辖

^① 《滇史论丛》第一辑“自序”。

^② 《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三期